

# 創科是香港未來最重要的新增長點



特區政府財政預算案公布在即，社會近期都很關心財政赤字問題。香港的財赤問題，有經濟周期性的因素，也有結構型的因素。對於香港而言，用節流的方法固然是應對財赤的一種短期手段，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開闢新的經濟增長點，做大香港經濟這個餅，才是解決財政壓力長遠之道，也是增加香港競爭力的關鍵所在。香港當前最具競爭力的行業是金融行業，而未來潛力最大的經濟增長點毫無疑問是創科產業。國家在2021年公布「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引導創科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在吸引國際創科要素聚集等範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助國家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對於香港而言，憑藉國家的支持，可進一步將創科結合新型工業化，為香港經濟創造新引擎，注入新動能。

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楊雲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高級研究主任

隨着近年北部都會區的規劃以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部署，香港正在朝着「南金融、北創科」的方向進行產業布局。接下來需要進一步針對釋放潛力、找準定位、加強協作三方面下工夫。香港的創科潛力明顯，擁有5所全球百強大學，基礎科研實力強勁，但如何引導發揮這股潛力仍是要突破的難題。由大學實驗室的研究成果到成為大家生活中的應用產品，需要科技轉化的過程。然而，目前仍有兩個制約因素。

## 企業要多投入科研

第一是科研投入的「用力」問題。2015年以來，香港本地研發總開支佔GDP比例一直徘徊在0.8%左右，至2022年時才突破至1.07%，雖然近年有所增長，但相比於中國內地的2.65%（2023）、美國的3.5%（2022）、深圳的5.81%（2023），仍有顯著差距。尤有甚者，在道有限的科研投入中，主要是依靠特區政府，工商機構投入只佔本地研發開支的41%；相比之下，以色列為86%，內地約為80%，而深圳更高達94%。科研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企業拉動、市場導向，科研成果是否能與產業發展緊密結合，這些因素都直接影響了成果轉化的效率，非常關鍵。

由於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主導程度最高的經濟體之一，服務業佔GDP超過90%，加上主要集中在金融業、貿易及物流業、專業服務業、消費類服務業，本地市場對創新科技的需求不大，亦沒有太大誘因投入資金進行科技研發。至於香港高等教育機構承

擔本地工商機構外包研發任務的比例亦較低。在2021年，香港工商機構投放在外判研發活動的總金額共67.33億元，外判研發活動主要由機構單位所屬企業集團的分支機構或總公司進行（51%），其次是機構單位所屬企業集團以外的機構（37%），第三位才是高等教育機構（6%）。

第二是科研成果的「發力」問題。由特區政府投入的科研項目，雖然成績斐然，但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方面仍有待完善。目前大學科研資金的撥款主要來源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其轄下的研究資助局，加上大學的評價體系和教授晉升制度，主要以科研論文數量和質量作為關鍵指標，對大學學者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缺乏激勵機制。目前大學體系也已注意到這一問題，並指出對考核關鍵績效指標進行改革，加入考慮研究的社會效益，但效果尚未顯現。此外，即使有學者有意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但因為涉及到專利權屬談判等各種問題，還有不少阻滯。加上香港本地缺少足夠實現產業化應用的科技和先進製造業企業，要在香港真正把科研成果實現大規模商業化並不容易。

## 提供產業型技術人才發展空間

上述情況反映出，雖然香港有高水平的大學，但缺乏聚集全球創科要素的大型企業平台。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如何吸引全球科技人才集聚是一個重要問題。過往，香港主要通過本地大學為平台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來港，但新增的教職數量有限，而且吸引到的，大部分都是從

事基礎研究的學術人才，並非產業型的技術人才。對於產業型人才來說，重要的是有良好前景的多元發展平台，包括龍頭性的大型科技企業以及產業應用導向的研發中心，這些都是香港目前所欠缺的要素。

因此，香港要進一步推動創科成為未來的經濟增長點，必須對焦點痛點，找準定位。首先，香港的優勢在於國際化的制度與環境，有利於與國際接軌，以及吸引國際高端人才。在創科的產業價值鏈上，香港最有價值的有兩點。一是在結合科研基礎，着力「研發」及「中試」環節，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新能源、微電子等結合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的技術領域。二是善用香港服務業優勢，推動與創科相關的各類「生產性服務業」，如融資、知識產權、供應鏈管理、檢測、國際貿易及銷售等。

基於上述定位，香港要着力強化應用研究及成果轉化的機制。一方面，由大學主導的科研，要強化成果轉化的動力，如鼓勵大學更新考核機制，加強對科研成果的應用價值的重視。此外，對大學的科技成果轉化機構給予更多支持，包括提供專業經理人，協助教授處理科研成果的對外合作事宜，在企業和學者之間推動應用研究、項目合作、技術合同簽訂等工作，降低因信息蔽塞而產生的潛在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除了本地的應用科研機構外，也要主動邀請內地及海外大型企業來港設立國際研發中心，結合企業力量及香港的國際環境，吸引國際科研人才，強化本港面向產業及市場需要的研發力量。

## 善用北都區平台功能

香港的獨特定位意味着需要與其他城市協同發展，完善創科產業鏈。事實上，根據2024年全球創新指數，香港在132個國家及地區中排行第18；而由香港、深圳及廣州的創新及科技業組成的「廣深港科技集群」則位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第2名。由此可見，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協作，能有效為香港的創科發展帶來增益。就此，香港可配合國家科技戰略部署，以河套為平台、北部都會區為基地，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機結合、協同創新。

北部都會區位於香港與內地的銜接處，隨着與內地的交通基礎的落成，硬聯通基本完善，未來兩地要進一步促進各類創新及生產要素的便利流動，發揮資源疊加的優勢。北部區的開發不是幾個地塊的簡單拼湊，而應是一個整體規劃的思維，從戰略高度出發，賦能香港的創科發展。一方面，要借助深圳強勁的產業實力和完整的創科生態鏈，帶動香港的技術轉移和商品化。就此，香港可選擇特定產業領域建設創科園區，開設研發中心、中試中心，引入內地創新企業進駐。另一方面，要善用深圳、東莞、中山等城市的高端製造業基礎，配合香港的「研發」及「中試」功能，進行高質量生產，打通本地創科發展上下游的產業鏈，大灣區各市也要積極探討合作共建「高端製造產業園區」的可能。

河套作為粵港澳重大合作發展平台，別具政策優勢，有條件先行先試，以制度創新引領區域開發。根據目前河套的規劃，可以預期，未來有一系列透過跨境聯通，發揮香港與深圳之間「兩制合作」優勢的措施，包括人流、物流等範疇的通行便利。然而，隨着河套的跨境合作趨向成熟，河套本身的協作治理機制，尤其是在管理組織架構方面，亦需有全面的突破創新，以追上發展步伐。目前，河套的「一區兩園」模式下，香港與深圳兩個園區實際上仍是各自管理、平行發展。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可仿效橫琴「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模式，探討實現一體化管理，並吸納社會力量，實現共同開發、共同管理、共同參與、共同分享，發揮河套「以點帶面」拉動香港創科發展的力量。

# 民主黨違背初心自尋絕路

馮煒光



民主黨早前召開中委會商討「未來路向」，會上表決通過解散民主黨的建議，並會提交全體會員大會表決。民主黨成立於1994年10月2日，一晃眼便快31年。筆者當日亦為創黨司庫，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之所以淪落到今天進入解散的地步，是因為民主黨受「黑金」操控，走了歪路有絕大關係，更因為民主黨在時代考驗面前不能認清形勢，投機取巧，以致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民主黨第一錯是違背初心。民主黨創黨時訂立了《十大基本信念》，第一條便是：「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支持香港回歸中國。」既然民主黨支持回歸，那麼就應該堅守「一國」之本，遵循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民主黨縱然對香港的民主進程和方式有不同意見，但勾結反中亂港勢力，絕對是錯誤選擇。1999年，民主黨主要成員李永達公開派發文件，寫着「（時任特首）董建華和中共是我們的敵人」。當時筆者已經覺得很不妥，表達了不同意見。當然，筆者直抒胸臆的代價，便是在黨內被冷落及排擠，但筆者並不後悔。「爭取民主便要與國家為敵」，這絕對不是筆者爭取民主的理念。民主的最終目的是讓國家更興

盛，而不是與國家為敵，這才是民主黨必須堅持的基本信念。可以說，自上世紀末開始，民主黨的不少「大佬」已帶民主黨走上歪路，忘記了初心。

## 接受「黑金」背離初心

民主黨第二錯就是接收了壹傳媒創辦人、涉及國安案件正在受審的黎智英的捐款，由此民主黨的實際言行和立黨初心漸行漸遠，開始變質。2014年，壹傳媒一位小股東披露約3,000份電郵，其中便有黎智英捐贈民主黨數百萬港元巨款的銀行本票影印本。一位退休會計師把這批電郵加以整理，寫成《泛民收錢實錄》一書，成為黎智英反中亂港「金主」的鐵證。黎智英反中亂港的惡行人盡皆知，他透過捐款，在背後操作民主黨實踐反中亂港圖謀。2013年至2014年，戴耀廷積極醞釀違法「佔中」，據上述壹傳媒小股東披露的電郵，黎智英孤注一擲力撐違法「佔中」，民主黨亦捲入這場違法活動，背離創黨以來秉持不參與違法行動的立場和原則。

民主黨第三錯是2019年修例風波時連「非暴力」的最後底線也放棄了。如今淪為通緝犯的民主黨成員許智峯，出任立法會議員期間，與黑暴沆瀣一氣，甚至在議事廳上演暴力衝擊秀，對立法會的保安員造成傷害。然

而，民主黨高層卻包庇甚至聲援許智峯的惡行。更令人髮指的是，當黨內廣受尊敬、一向以主持會議公正見稱的陳莊勤律師公開撰文抨擊黑暴時，卻被另一黨員林卓廷投訴。民主黨紀律委員會竟然裁定陳律師犯錯，以「陳莊勤損害黨的聲譽」為由革除其黨籍，陳律師最終選擇主動退黨。陳律師因為生病於2022年辭世，他生性正直豁達，相信他不會因此事而抱憾，不過此事已印證了民主黨包庇黑暴，完全站在法律和正義的對立面，為了政治利益，漠視法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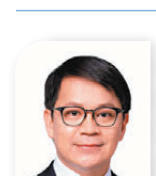
## 執迷不悟 一條路走到黑

民主黨的第四錯，亦是最錯的，就是不識研判大勢。中央採取標本兼治的措施，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重大轉折，但民主黨仍執迷不悟，不改弦易轍。2020年底，特區政府依法取消反中亂港政棍的議員資格，包括以主持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為名、「拉布」逾7個月的公民黨郭榮鏗。民主黨一眾立法會議員與這些反中亂港勢力一同辭職，頑固對抗，該黨的立法會議席全部「清零」。

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的重要階段，民主黨冥頑不靈，陷於萬劫不復的絕境，如今「收檔」，完全是咎由自取。

# 加強灣區制度對接 支持創新產業發展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早前到橫琴、前海等地調研，並

與特區官員舉行座談。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後召集官員，部署落實夏主任的指導意見，並提出要積極和主動與大灣區內地城市聯動合作，推動灣區一體化發展，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開拓新興市場。制度對接、規則銜接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聯動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發揮自身獨特優勢的重要工作，隨着大灣區互聯互通基礎設施配套越發完善，如何在制度、規則等軟件上有所突破，成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

## 以「內聯」促「外通」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對於如何加強制度對接、規則銜接有明確的內容。中央提出，要「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合作，強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同時，《決定》也提出，要「健全香港、澳門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機制」。這也顯示在中央的戰略之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香港，要以「內聯」進一步促進「外通」優勢，進一步發揮港澳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獨特作用。

事實上，站在香港的角度而言，打通粵港澳三地之間的制度、規則銜接，是發展創新科技等新興產業的先決條件。「產學研」三大要素，香港在「學研」方面具備一定基礎及優勢，幾大專府中有着眾多高質素的科研人才。早前芯片巨頭黃仁勳來港時，便稱讚港科大的人工智能研究是世界級水平，比倫港科大是中國的MIT（麻省理工大學）。

要讓有意創業的科研人才發揮所長，便須將學研能力與產業相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在多個創新科技領域，擁有成熟、完整的製造產業鏈，並不斷完善升級。

將粵港澳三地的優秀產學研資源匹配對接，共同發力，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也是中央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要初衷。

總體而言，三地共同發展創科產業，需要人流、物流、資金流等等環節的暢通流轉。不同產業涉及不同重點的制度對接、規則銜接，如何更高效率地開展相關工作成為重點。本港一名8個月大女嬰獲得內地捐心，成為第二宗跨境器官移植成功的案例，便為有關工作帶來了啟示。兩地多個不同部門展開合作，共同打通影響跨境「送心」的各個環節，包括兩地在器官出入境法規方面的限制，以及醫療體系中的差異等。這不僅能確保相關工作的有效，也能為如何日常化有關安排提供參考。

## 暢通數據跨境

故此，特區政府在部署制度對接、規則銜接的工作時，亦可以產業分類的方式進行統籌，抽調跨部門團隊以具體產業為主題，與內地各部門展開工作。以人工智能產業為例，最首要的便是須打通數據跨境的各個環節，在確保數據自由流通的同時，亦要依國際標準保障數據安全和用戶私隱。又例如專業服務領域，則涉及專業資格相互認證，在匹配國際標準與市場需求之間找到最大公約數。

上述工作僅是對銜接工作的其中兩項，當中涉及的法律、機制、執行等層面的具體工作更是紛繁複雜，需要三地政府通力合作，下大力氣共同推進。以產業、行業為切入點，務必令相關工作更以產業發展需求出發，保證工作的效率與效能，亦是特區政府推動產業、服務企業的具體體現。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便指出，「牢記時不我待的緊迫性，持續『提速、提量、提質、提效』」。在打通粵港澳三地制度、規則銜接上，特區政府也須更有針對性地打通要素環節，解決制度規則障礙，為香港發展創新產業的目標提供有力支持。

# 鼓勵青年打桌球 促體育產業多元發展

鄧飛 立法會議員 教聯會副會長



近年來，香港桌球界湧現了許多殿堂級高手和年輕新星，例如「神奇小子」傅家俊、吳安儀及溫家琪等。他們在國際及本地桌球賽事中屢獲殊榮，讓世界感受到香港桌球的魅力，甚至吸引了國際頂級桌球大師，如卓林普及奧蘇利雲透過優才計劃落戶。他們的卓越表現不僅提升了香港在桌球界的知名度，也激發了年輕人對桌球運動的興趣，促使特區政府重新檢視現行規例，以推廣桌球運動。

經過一番審視，康文署早前宣布自2月25日起接受持牌桌球館的申請，放寬青少年進入桌球館的限制，具體措施包括將最低年齡限制由16歲下調至8歲，延長青少年進入持牌桌球館的時間，並允許穿着校服的人士進入，以鼓勵更多青少年接觸桌球運動。

然而，桌球室在社會上一直給人烏煙瘴氣、龍蛇混雜的刻板印象。因此，有意見認為，發展青少年桌球運動不應推銷商業桌球館在內，建議政

府在社區中心或資助學校改裝課室來推行。坦率地說，筆者本來也是秉持這種看法。後來做了一些調研之後發現，這一想法其實不切實際。

目前，康文署轄下只有11間設有桌球設施的體育館，分佈於港九新界各地，其中只有一間提供英式桌球，其餘都是美式桌球，且僅提供一兩張球桌。這樣的場地數量明顯不足，無法有效支持青少年桌球運動的發展。雖然西貢一些文娛中心，例如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設有好幾張桌球檯，但對許多學校來說，位置過於偏遠。至於改裝學校課室，就算按照相對面積比較大的千禧校舍標準，中小學的課室面積均為67平方米，而康文署的一個美式桌球室面積已達62平方米。因此，若要在已經緊湊的校舍中再騰出一個課室作為桌球室，實在困難重重。

相比之下，商業桌球室遍布市區，數量巨大且交通方便。當商業桌球館發現青少年是一個潛在的市場時，自然會產生動機調整營運策略，包括積極落實康文署和控煙辦的各項要求，甚至發展規模化的校隊業務，創造更適合中小

學生的訓練環境。因此，若要消除公眾對於未成年人進入商業桌球館的憂慮與不良印象，便需要各界合作，「寓教於商」，從而達至推廣桌球體育運動的政策原意。

儘管康文署放寬限制，允許低至8歲的兒童進入桌球館，但若只是單純開放而缺乏支援，靜待機緣巧合，期望孩子無師自通，自學成才，無疑是浪費時間和資源，亦達不到政策目的。因此，筆者建議教育局或康文署多行一步，鼓勵學校成立校隊，利用學校津貼外聘專業教練，借助學校附近的商業桌球室場地進行培訓。這樣不僅能提供專業指導，同時可確保青少年的安全，也能使學校和家長更加安心。

發展體育運動從來都是先普及、後拔尖。因此，要將桌球運動在青少年群體中普及化，特區政府不妨從鼓勵學校組織桌球課外活動和校隊開始，當校隊發展到一定數目，便可推行校際桌球比賽，以營造更熾熱、更健康、更具規模的桌球運動氛圍，從而發掘具潛力的年輕選手，最終培養出優秀運動員，長遠促進體育產業多元發展。